

中国符号学研究 20 年

王铭玉，宋 尧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摘 要：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起步较晚，但是研究的起点高，发展速度快。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在短短的 20 余年间已经追赶上了国际研究潮流。目前，符号学思想已渗透到语言学、哲学、文学、传播学以及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这里对中国符号学研究 20 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总结。概括论述三个发展阶段中的研究内容及重点，着重考察中国符号学研究的现状：研究方向、主要课题及研究成果。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符号学研究对比，来发现我国符号学研究中的特色及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符号学在 21 世纪总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符号学；研究

The Study of Semiotic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in China

WANG Ming-yu , SONG Yao

(Department one,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Luoyang 471003,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semiotics in China started late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in the West, but it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and now has caught 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in this field. At present, semiotic study has penetrated into many areas such as linguistics, philosophy,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social ar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general survey of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discussing the three-staged subject matter and achievements, highlighting the major projects and main findings, and on this basis, predicting the direction and prospects of semio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semiotics; study

“符号学”的思想是在 20 世纪初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Saussure, F.) 首先提出的。

“符号学”在英语中有两个意义相同的术语：semiology 和 semiotics，这两个词都用来指这门科学，它们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由索绪尔创造，欧洲人出于对他的尊敬，喜欢用这个术语；操英语的人喜欢使用后者，则出于他们对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 (Peirce, C.) 的尊敬。

从 20 世纪符号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符号学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语言学的、非语言学的和折衷的。索绪尔、叶姆斯列夫 (Hjelmslev, L.) 巴特 (Barthes, R.) 为第一类，即带有语言学倾向的符号学研究方向；皮尔斯、莫里斯 (Morris, C.) 西比奥克 (Sebeok, T.) 为第二类，即通常所说的一般符号学方向；艾柯 (Eco, U.) 和其他一些符号学家则为第三

类。他们彼此的立场区别主要是语言结构是否应成为非语言文化现象的模型或“蓝图”。

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勃兴于 60 年代的法国、美国、意大利以及前苏联，之后，它很快就跨越了政治集团的分界而成为统一的学术运动。目前，符号学正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向各个学科进行渗透，对符号学的认识与运用正在形成一种科学大趋势。

西方的符号学研究开展得较早，目前已形成各种理论体系和研究流派。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起步较晚，真正成规模的符号学研究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的。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符号学研究的起点较高，并且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基本上追赶上了国际研究潮流；同时，由于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极为丰富的符号学内涵，因此根植于这种文化背景中的中国符号学研究，从起步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勃勃生机。可以认为，中国符号学研究正在成为也必然成为世界符号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研究西方符号学的同时，必须关注本国符号学的研究状况，不断促进中国符号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三个阶段

纵观中国符号学研究 20 余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把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1980—1986 年——起步阶段（发表论文约 45 篇，年均不足 7 篇）。自 80 年代初起，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国际符号学学术活动，及时地向国内传达、介绍国际符号学研究动态。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是对国外各符号学家主要思想的引介、对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总体论述和研究工作。其中研究介绍索绪尔、巴特等符号学家理论思想的文章占了总数的近 40%。

2. 1987—1993 年——平稳发展阶段（发表论文约 87 篇，年均 12 余篇）。从 1987 年开始，我国的符号学研究重心逐渐发生转移。第

一，从对符号学、语言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总体的、粗线条的论述转而开始对符号学具体理论的更细致、更深入的分析研究。例如：对符号的线性、任意性的讨论，对各符号学家理论的比较研究。第二，符号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及崭新的学说开始被应用于具体的语言学研究中，如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第三，符号学研究开始涉及语言学以外的领域，如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用符号学观点来阐释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等。第四，一些学者开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学思想，例如对公孙龙、荀子等名家著作中符号学思想的论述。在此阶段，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渐成气候。198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召开了京津地区部分学者参加的符号学研讨会，会后，中国逻辑学会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分别成立了符号学研究会。

3. 1994 年至今——全面展开阶段（至 2000 年发表论文约 280 篇，年均 40 余篇）。1994 年后，符号学的研究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符号学的探索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符号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1）除了继续对一般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外，还注重引进诸如叙述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电影符号学、话语符号学和主体符号学等其他分支符号学思想。（2）对语言符号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特别是关于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研究：我国学者开始对索绪尔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如符号的任意性问题）；随着《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版的出版，索绪尔的某些观点得到了澄清，掀起了一股对索绪尔语言学观点再认识的热潮。（3）符号学向各个学科的渗透进一步加强，符号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已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和学科的具体研究中，符号学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可以说，符号学研究在语言学、哲学、文学、文化、艺术、传播学、民俗学等各个领域已全面展开。（4）对非语言符号的地位、功能开始予以关注，如对体语符号交际功能的探讨和研究。（5）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典籍中符号学思

想的挖掘和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 尝试用符号学方法阐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在这个阶段, 学术研讨蔚然成风。1994 年在苏州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 1996 年在山东大学、1998 年在西南师范大学、2000 年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2002 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这标志着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已步入正轨。

研究表明,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历史虽短, 但进步较快, 时至今日, 在符号学的诸多领域里我们已经基本上追赶上了国际研究潮流。究其原因, 一是因为中国学者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吸收、消化得非常快; 二是因为中国文化土壤中蕴有极为丰富的符号学内涵, 它随着符号学的兴起不断给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注入新的营养。从研究领域看,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已经涉及到哲学、语言学、逻辑学、文学、美学、民俗学、传播学、国情语言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电影等诸多领域。其中, 在哲学、语言学、逻辑学和文学等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深度。

二、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及成果

如上所述,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虽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但成果不菲, 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符号学用了 40 余年所走过的路。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有四个, 分别为符号学基本理论研究、语言符号学研究、符号学应用研究、文化艺术符号学及文学符号学研究。

1. 符号学基本理论研究

1.1 国外符号学名家理论的引介及研究

我国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巴赫金等著名符号学家的思想理论上。研究从最初的翻译、介绍逐渐发展起来, 对国外符号学专著的主要译介作品有: 《普通语言学教程》(<瑞士>索绪尔著, 高名凯译, 1985) 《符号学入门》(<日>池上嘉

彦著, 张晓云译, 1985)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英>霍克斯著, 瞿铁鹏译, 1987) 《符号学与文学》(<美>司格勒斯著, 谭大立等译, 1988) 《符号学概论》(<法>吉罗著, 怀宇译, 1988) 《指号, 语言和行为》(<美>莫里斯著, 罗兰、周易译, 1989) 《符号学理论》(<意>艾柯著, 卢德平译, 1990) 《符号学原理》(<法>巴特著, 黄天源译, 1992) 等。这些译著的出版, 为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符号学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对上述名家理论引介的同时, 中国学者还对各家理论展开了较为深刻的独立研究及对比研究, 研究的内容更多地集中在对其语言符号学理论的阐述方面。比如, “略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李廷揆, 1986)、“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刘润清, 1992)、“巴赫金与社会符号学”(胡壮麟, 1994)、“对皮尔斯符号思想的语言学阐释”(王铭玉, 1998) 等。

1.2 对符号的认识及界定

(1) 对符号的界定

研究符号学, 首先要对符号概念本身有一个正确认识。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尚不深入。目前, 较为流行的界说来自于双重意义学派的思想, 即把符号看作是“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 并由此概括出符号的三个必备特征: 符号必须是物质的; 符号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 代表其他东西; 符号必须传递一种社会信息, 即社会习惯所约定的、而不是个人赋予的特殊意义。这一观点把符号的物质性和思想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因此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21: 5]

(2) 符号的分类

由于符号的复杂性所致, 对符号的分类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按照符号的来源、产生方式以及意指功能把符号分成自然事件类、人为目的类和诗意表现类三种类型。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则根据符号三要素(媒介、对象和解

释)的相互关系建立了“符号的三合一分类方法”,其核心类别有三种:图像符号(icon)、标志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将符号分为六种:信号(signal)、症状(symptom)、图像(icon)、标志(index)、象征(symbol)以及名称(name)。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者对符号的分类问题也极为关注。李延福教授以符号的主、客观性质关系为依据将符号分为两大类——客观性质的逻辑分类及主观性质的美学分类。[12:57]连甬认为,将生活中的语言以外的各种符号归为如下五种主要形式似乎更为合适:广告符号、实物符号、行为符号、音像符号和自然符号。[14:69]

我们认为,可以对符号进行“指谓关系”分类,即以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性质为依据进行分类。这种方法把符号概括为五大类:征兆符号——这是一种广义上的符号,或称准符号,其媒介与信息之间有着自然的、有机的联系(如林中起烟表示篝火,水面波动表示有鱼);象征符号——这类符号以所传达信息和自身的特征和性质作为符号(如五角星和八一象征中国人民解放军,鸽子图案象征和平);

感应符号——这类符号以视觉物或听觉物作为信息的载体、作为传递信息的假定的符号(如我国古战场上的击鼓进攻、鸣锣收兵,城市交叉口的红绿灯);语言符号——因为语言是音(形)、义结合的统一体,所以它构成交际和信息符号的基本形式,被称为特殊的,也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替代符号——这类符号不是代表事物、现象或概念,而是替代第一性符号,所以也称第二性符号(如数理化中的各种符号、谓词逻辑中的操作关系符号、人造语言等)。[21:5-6]

1.3 对符号学研究领域及作用的认识

(1) 对符号学研究领域的认识

对符号学研究领域的认识目前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的研究范围涉及交际的全部,任何表意的东西都在符号学研

究范围之内。另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研究领域涉及到有意义的和约定的交际形式。第三种观点原则上局限于研究交际惯例系统,即只研究作为交际惯例系统的信号。国内的相关研究有:“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许艾琼,1994)、“当代符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胡壮麟,1999)、“论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郭鸿,2002)等。

(2) 对符号学作用的认识

对符号学作用的认识,当代符号学家有两个极端,一类是过于武断和自负,另一类则过于沮丧。前者把世界万物都看作符号,认为符号学的学说是最全面的领域。后者则认为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只存在于讨论话题中,并认为符号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至今尚未弄清许多问题的实质,像符号是怎么组成的,它受什么规律支配等。应该说,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还比较客观,大多数学者把符号学看作是一种哲学观和方法论。相关的研究文章有“符号学的研究和作用”(张卫江,1995)、“试论符号的功能”(涂德钧,1996)等。

(3) 符号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

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究竟如何,看法也不一致。总体说来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另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从属于语言学;介于二者之间的观点则认为语言学和符号学是两个独立学科,各有其独立的研究范围。

多数名家持第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分支,符号学的法则也适用于语言学。其代表人物有早期的索绪尔和皮尔斯等人,当代的有雅各布森和韩礼德(Halliday, M.A.K.)等人,此外还有研究人类学的拉康(Lacan, J.)。

巴特和其他一些符号学家把符号学看作语言学的分支。他认为,只要人们走进具有社会学的真正深度的一些领域时,就会遇到一些语言学之外却仍然属于符号学范围的集合,而

这些集合又只能用言语行为才能解释,并且任何符号学体系都有言语行为介入。

作为一种折中,艾柯认为,“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最强有力的符号工具,由于语言学的地位比其他符号系统更为确定,符号学在许多方面依靠语言学概念。”[7:2]我们也持类似观点,把语言学和符号学视为两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但同时认为,二者彼此交叉更能发挥综合学科的优势。“虽然‘符号学’的思想是由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然而,‘符号学’从其萌芽之日起却始终未能真正与‘语言学’联姻,对此,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均有一种‘失衡’与‘缺憾’感,所以建立一门语言符号学早已是大势所趋。”[21:5-6]

除了对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进行讨论外,我国学者在研究中还涉及到符号学与哲学、逻辑学、传播学及语言国情学等学科的关系。比如,“符号学与国情语言学的关系”(吴国华,1994)“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陈道德,1997)“符号学与语言学和逻辑学”(向容宪,1998)“民俗学与符号学”(高乐田,1998)“名学与符号学”(曾祥云,1999)等。

(4) 对符号学历史及发展现状的总结

对西方符号学发展史的介绍。比如:“西方符号学的诞生及发展述略”(户晓辉,1991)“符号学的由来及其发展”(苟志效,1993)“现代符号学理论源流浅探”(周祯祥,1999)“现代西方符号学理论初探”(林笳,2000)“俄罗斯符号学理论的历史流变”(陈勇,2002)等。

对我国历史上符号学思想的追溯。以我国古代丰富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为对象,努力探寻其中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如“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李先煜,1993)“荀子正名理论的符号学意义”(许艾琼,1993)“《易》的符号学的性质”(周文英,1994)“论先秦哲学的符号学致思趋向”(苟志效,1995)“《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李先煜,1996)“‘说文解字’中的符号思想初探”(高

乐田,1997)等。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会大大推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符号学的研究。

2. 语言符号学研究

2.1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思想的研究

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学思想对我国学者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对索绪尔的研究也始终是语言学者们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我国学者对索绪尔语言学、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上:

(1) 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及其根本原则。如:“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岑麒祥,1980)“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徐志民,1980)“索绪尔语言学的根本原则”(皮鸿鸣,1994)等。

(2) 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思想的论述。比如:“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杨信彰,1996)“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徐思益,1980)“组合和聚合”(徐盛桓,1983)等。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索绪尔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缺憾。如一些学者发现索绪尔的理论对同形异义、一词多义等语言现象束手无策,因此指出,符号的能指与物质实体是分离的,符号的能指与其所指意义也是可以分离的。[28:16]索绪尔思想受到的另一挑战表现在对其符号任意性原则的争论上,并由此导致了学者们开始纷纷论述符号的象似性(iconicity)问题。比如:“语言的象似性探微”(杜文礼,1996)“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王寅,1999)“论语言符号的拟象性”(文旭,1999)“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王寅,2002)等。

(3) 对索绪尔与其他学者思想的对比研究。如:“索绪尔对乔姆斯基的影响”(刘耀武,1984)“班威尼斯特对发展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所做的贡献”(周忆宁,1985)“布龙菲尔德和索绪尔”(许国璋,1989)“索绪尔语言理论与陈望道之‘功能说’”(卢凤鹏,

1996)等。

(4) 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及对索绪尔思想的再认识。随着新版本的出现和人们对其著作的深入挖掘和研究,我国学者对索绪尔语言学和符号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解释。如:“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许国璋,198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评介”(信德麟,1993)“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戚雨村,1995)“再论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语言符号的性质”(乐眉云,1997)“追寻索绪尔语言学思想:读《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王克非,1997)“索绪尔两个教程的比较与诠释”(张绍杰、王克非,1997)“索绪尔符号观再评价”(卢德平,2002)等。

2.2 语言符号的研究

(1) 语言符号的性质和功能的研究。乐眉云教授在《再论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1997)这篇文章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索绪尔符号语言学思想中包含的语言符号的性质,并将其总结为六矛盾的统一:任意性与约束性,社会性与心理性,不变性与可变性,相关性与区别性,形式与物质实体,组合关系与联想关系。论述语言符号特性的文章还有不少,如:“语言的生成性”(徐盛桓,1984)“语言符号的可逆关系”(王铭玉,1997)“浅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关系性和社会性”(王文宇,1997)“语言的社会符号性”(刘家荣,2002)等。

(2) 语码转换的研究。语码转换是近年来社会语言学、语法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和会话分析等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从以上五个角度的研究分别揭示了语码转换的不同方面。如“语码对位探讨”(龙日金、彭宣维,1993)“语码选择的语用机制”(刘承宇,1999)“语码转换研究述评”(何自然,2001)“从 Scotton 的标记模式看语码转换研究的新进展”(李经纬,2002)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文章。

(3) 标记理论的研究。任何语言符号系

统中都存在着两极对称现象,即有标记与无标记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语言分析的所有层次上都发挥着作用。标记理论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相关文章不断问世,比如:“语言的‘有标记’和‘无标记’”(徐盛桓,1985)“关于标记理论”(王立非,1991)“布拉格学派标记理论管窥”(张家骅,1992)“类型学中的标记模式”(沈家煊,1997)“论语言单位的标记性”(李生春,1997)“标记理论的再评价”(张风,1999)“标记主位及其语用功能”(王扬,2000)“语言标记性的诠释与发展”(王立非,2002)等。

3. 符号学应用研究

符号学理论作为一门新的方法论和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一点在语言学研究体现得最为鲜明。

3.1 符号学理论在语言学诸学科研究中的应用

(1) 语义学。符号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理论的不完善也相应地促进了语义学的发展。符号学思想应用到具体的语义研究中的实例比比皆是,例如考察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对语义学理论的影响——“索绪尔的语符关系及其对语义理论的影响”(徐海铭、王文琴,1998);用组合与聚合思想来研究语义——“语义的组合和聚合”(王德春,1987);用符号关系来解释词汇的意义——“符号关系与词义”(郭聿楷,1996);用符号系统的层级性理论研究语义及民族文化语义——“语言符号的意义”(王铭玉,2002)“试论民族文化语义与两级符号系统”(刘佐艳,1999)。

(2) 语用学。目前语用学的研究与符号学理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在语用学的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符号学理论。如“语言符号的局限和语用学”(钱冠连,1991)“符号学与‘颜色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运用”(唐振华,1996)“语言符号的语用功能”(徐继宁,1999)等。

(3) 翻译理论及实践。将符号学应用于翻译领域已成为国内外一些学者和翻译理论工作者的共识。如“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罗进德, 1988)、“论翻译中的等值: 一种社会符号学的方法”(李广荣, 1993)、“符号学翻译观与文化翻译学”(隋然, 1994)、“从符号学角度谈翻译”(温洪瑞, 1997)、“社会符号学历史渊源及其翻译原则”(李明, 1997)、“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张新木, 1998)、“我国传统翻译标准的符号学探讨”(王治江, 2002)等。

(4) 具体语言现象研究。随着符号学理论的不完善以及我国学者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深化, 用符号学理论来探究具体的语言现象、从符号学角度重新考察具体的语言运用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如“符号学理论在象征词语分析中的应用”(王铭玉, 1989)、“话语序列的符号学含义”(陈忠华, 1994)、“从符号学角度看转喻”(华劭, 1996)、“歧义句的符号学问题”(车晓燕, 1998)、“委婉语的符号学分析”(辜同清, 1999)、“从符号学的角度看隐喻的生成”(周红红, 2000)等。

3.2 符号学理论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

(1) 广告设计、创意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广告语言创意、设计中所使用的符号学方法、符号类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如“论符号学方法在广告语言创意设计中的运用”(苟志效, 1994)、“符号学与广告语言”(王少琳, 1994)、“从符号学原理谈广告的创意特征”(黄鹂, 1997)、“广告语言中的符号前景化”(胡漫、吕乐, 2002)等。

(2) 非语言交际中的符号学问题

非语言符号作为符号的组成部分, 在交际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交际中的非语言符号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如: “论身势语及其符号功能”(庄和诚, 1995)、“非言语交际: 非语言符号的地位与阐释”(顾嘉祖, 1999)、“体语符号的交际功能与文化差异”(陈良旋, 1999)等。

4. 文化艺术符号学及文学符号学的研究方向

4.1 文化艺术符号学

文化艺术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分两大部分。一部分主要探讨国外文化符号学理论, 比如“走近巴赫金的符号王国”(胡壮麟, 2002)、“符号学王国的构建——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张杰, 2002)、“文化符号与文化结构分析”(顾嘉祖, 2002)、“劳特曼及其文化符号学理论”(赵蓉晖, 2002)。另一部分试图用符号学方法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如“传统文化典籍的符号学特征与典籍阐释”(邓生庆, 1993)、“从符号学看中国传统文化”(李幼蒸, 1995)、“伏羲与中国文化: 关于中国文化发生的符号学研究”(刘尧汉, 1995)等。同时, 还有一些学者把艺术形式也看作是符号体系, 他们尝试讨论艺术符号的功能、艺术符号的解析等问题。如“戏曲演出的符号化特征”(丁和根, 1990)、“论艺术文化的符号学功能”(李西建, 1992)、“艺术接受的符号学阐释”(董强, 1995)、“再论艺术符号的转换规律”(齐效斌, 1999)等。

4.2 文学符号学

文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也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文学符号学理论的研究和探讨, 另一方面则是运用符号学理论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符号学分析和解读。

理论研究包括: 对西方的“文学符号学”等理论的介绍和评论; 对符号学与文体学关系的探讨; 文学语言的符号学特性、符号功能的探讨等。如“漫谈法国叙述符号学”(黄晓敏, 1995)、“走向文学的符号学研究”(王宁, 1995)、“能指与所指: 诗歌语言的符号学特性初探”(任裕海, 1997)、“试论诗歌意象符号的交际价值”(王少琳, 2002)等。

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解读也是近年来文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特点之一, 如“符号学阐释: 周作人散文小品的语言艺术”(张光芒, 1993)、“美学、符号

学视野中的童话与神话”(李秀云,1999)、“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解读兰斯顿·休斯的诗歌形式”(罗良功,1999)、“符号与《红楼梦研究》”(夏荷,2002)等。

以上我们从四个主要方面考察了中国符号学研究的现状与成果,所列举的代表性作品是从我们所收集的近 500 篇论文中选择出来的。实际上,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中国学者的符号学专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看,同样喜人,它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符号学研究的迅猛崛起。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专著有:《符号:语言与艺术》(俞建章等著,1985)《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何新著,1987)《从哲学看符号》(肖峰著,1989)《艺术符号与解释》(杨春时著,1989)《科学符号学》(王德胜著,1992)《生活中的神秘符号》(王红旗著,1992)《理论符号学导论》(李幼蒸著,1993)《修辞符号学》(杨习良著,1993)《数学符号学概论》(刘云章著,1993)《超越本体》(丁尔苏著,1994)《现代诗歌符号美学》(周晓风著,1995)《你身边的符号:符号学入门》(连甬著,1997)《广告的符号世界》(吴文虎著,1997)《〈史记〉文化符号论》(齐效斌著,1998)《意义与符号》(苟志效著,1999)《新闻文化与符号》(刘智著,1999)《符号表达原理》(孟华著,1999)《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陈治安、刘家荣主编,1999)《汉字符号学》(黄亚平、孟华,2001)《符号学研究》(王铭玉、李经纬主编,2002)等。

三、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展望

纵观中国符号学研究的 20 年历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学者对一般符号学基本理论的探讨尚不够深入,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细化;(2)与其他部门符号学相比,有关语言学方面的符号学研究开展得最早、成果最丰富,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其他领域符号学研究

的前面,创建语言符号学的时机已经成熟;(3)符号学思想和理论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应用研究在我国开展得比较迅速,涉及的领域多,且成果非常显著;(4)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如对传统文化典籍中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和整理,研究汉字的符号特征等。这些研究能够为世界符号学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20 世纪已经过去,21 世纪将会是“符号学大有作为的世纪”。我们可以预言,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将会在 21 世纪呈现出以下几大发展趋势:(1)符号学向其他学科的渗透将进一步增强,也就是说符号学作为研究的方法论和视角,其作用将不断得到加强。它不仅使其他学科的研究更加科学化,还将产生一批新的交叉学科;(2)符号学理论对语义学、语用学、交际理论、翻译等学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反过来,随着我国上述学科的研究不断深化和细化,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必然会对符号学理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使符号学理论愈加完善,使符号学的研究在整体上更上一层楼;(3)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将逐步融汇到国际性研究中。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将与世界符号学研究水平靠近,并在许多领域能够站在符号学研究的前沿;(4)中国文化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的灿烂文化、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及我国的象形文字等领域,都蕴藏着极大的研究潜力。这一领域的符号学研究最具中国特色,必将会在世界符号学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 陈力丹. 符号学:通往巴别塔之路——读三本国人的符号学著作[J].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6, (1): 70-73.
- [2] 陈治安, 文旭. 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第三届研讨会综述[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9, (1): 9-12.
- [3] 池上嘉彦(日). 符号学入门(张晓云译)[M].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 [4] 高乐田.《说文解字》中的符号思想初探[J].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 (2): 53-58.
- [5] 苟志效. 符号学的由来及其发展[J]. 宝鸡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3, (1): 55.
- [6] 何欣.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启示[A]. 陈治安. 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C].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72-182.
- [7] 胡壮麟. 当代符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J]. 福建外语, 1999, (1):1-9.
- [8] 李经纬. 符号类型及其在英语广告中的运用[A]. 陈治安. 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C].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253-261.
- [9] 李廷揆. 略述罗朗·巴耳特的符号学[J]. 法国研究, 1986, (2): 89.
- [10] 李先煜. 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J]. 哲学研究, 1993, (6): 62-69.
- [11] 李先煜. 论先秦名家的符号学[J].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5, (5): 78-85.
- [12] 李延福. 符号分类概观与人类语言特征——兼谈语言个体发生对语言学习的启示[J]. 山东外语教学, 1994, (3-4): 57.
- [13]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14] 连甬. 你身边的符号——符号学入门[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 [15] 罗兰·巴尔特(法). 符号学原理(黄天源译)[M].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
- [16] 皮鸿鸣. 索绪尔语言学的根本原则[J]. 武汉大学学报, 1994, (4): 82.
- [17] 索绪尔(瑞士).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 [18] 索振宇. 索绪尔及其《普通语言学教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 (2):51.
- [19] 特伦斯·霍克斯(英).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20] 王铭玉. 对皮尔斯符号思想的语言学阐释[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8, (6):1-7.
- [21] 王铭玉. 符号学与语言学[J]. 外语研究, 1999, (2):5-6.
- [22] 王铭玉, 李经纬. 符号学研究[C].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2.
- [23] 向容宪. 符号学与语言学和逻辑学[J]. 贵阳师专学报(社科版), 1998, (1):13-16.
- [24] 肖峰. 从哲学看符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25] 袁影. 异中求同——全国首届“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述评[J]. 外国语, 1994, (6): 24-26.
- [26] 乐眉云. 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J]. 外国语, 1994, (6):15-18.
- [27] 乐眉云. 再论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 语言符号的性质[J]. 外国语, 1997, (4):5-10.
- [28] 张德禄. 论符号语言的本体[A]. 陈治安. 语言与符号学在中国的进展[C].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6.
- [29] 张德禄. 语言符号及其前景化[J]. 外国语, 1994, (6): 9.
- [30] 张光明. 关于中外符号学研究现状的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5, (5):1-5.
- [31] 张绍杰, 王克非. 索绪尔两个教程的比较与诠释[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7, (3): 28-35.

收稿日期: 2002-05-20

作者简介: 王铭玉(1958-), 男, 河南洛阳人, 教授, 博导。研究方向为普通语言学、符号学、符号语言学。

宋尧(1968-),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博士, 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修辞学和演讲学。